



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汤在新 | 自选集

TANG ZAI XIN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汤在新 | 自选集

TANG ZAI XIN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汤在新自选集/汤在新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9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ISBN 978-7-218-05485-8

I. 汤… II. 汤… III.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文集
IV. 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3245 号

责任编辑	杨小虹
封面设计	张力平 吴德灏
版式设计	虹 峰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75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5485-8
定 价	5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s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s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96】

马克思理论的探索者^{*}

曾国安

我是汤在新教授培养的博士生中的开门弟子，我的学士、硕士学位也是在他主政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时获得的。老师多年的教诲，记忆犹新；老师的道德文章，为广大学子所景仰。这里，把我所知道的老师的生平、治学之道和学术成就概述于下，以飨读者。

动荡时代中的平静的一生

汤老师的中小学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度过的。这虽然是一个连年战乱的动荡年代，他却是在平静、安宁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时代，政治运动连年不断，他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外，大体是一帆风顺地度过半个世纪。他的一生，如他

^{*} 根据本丛书体例，首篇应为作者的《学术自传》，由于汤在新先生已去世，这里收录他的开门弟子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国安先生为他撰写的《马克思理论的探索者》代替。该文详细叙述了汤在新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

自己所概括的，是动荡时代中的平静的一生。

1931年4月，他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职员家庭。父亲毕业于甲等工业学校的矿冶专业，后改学会计才在政府机构谋得一个科员级职务。父母开明、慈祥，对子女注重引导，极少打骂。弟兄五人和睦相处，且都好学。少年时期，在大后方的一个宁静的小城（成都附近的新都县）读书，放学后游玩于与家一墙之隔而又风景绝佳的桂湖公园，假期则沉浸于桂湖儿童图书馆藏书的童话世界中。虽然揪心的警报声、半夜被叫醒、迷迷糊糊地随父母“疏散”到城外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但总算没有见到日本飞机轰炸留下的血淋淋的场面。

抗战胜利前夕，举家迁回成都，1946年考入著名的四川省立石室中学读高中。这是一所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老校，云集了各县的高材生。在这里，贫苦好学的优秀生可以获得高额奖学金。教室座位按成绩排定，留级生在最后。由此引发同学间激烈的竞争，形成浓厚的读书风气。这所学校的师资很强，听课如饮醇酒。有时老师也借题发挥，抨击时局，但总的来说，政治气氛不浓。汤老师说，他在那里是属于不用功的一类，成绩一般。他除了喜好运动，还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课外书籍，省图书馆的国内外经典文学名著，他几乎全部浏览过，这使他逐渐懂得了社会，了解人间疾苦。他也喜爱历史，包括历史小说，每当读着中国近代丧权辱国的史实，总是掩卷暗泣。也许正是这种熏陶，促使他培养起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忧国忧民的情结。这一切推动他在政治上觉醒，也有助于他以后对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

1949年秋，在成都解放的前半年，他考入四川大学农艺系。由于物价疯涨，他父亲的工资已难以维持生计，只能卖房为五个孩子交学费。汤老师一边读大学一边在小学教书。解放后不久才摆脱了困境，不仅不用交学费，甚至伙食费也是政府发给。大学二年级时，他按照自己的兴趣，转入农业经济系。他听课不多，但自学认真，考试成绩不错，专业课“农业经济学”居然得到105分！授课老师是系主任，颇为开明，说：“比我讲得好。”1953年秋毕业时，他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指定进入当时农业经济系很少人报读的经济地理专业。第一年学四门政治课，重点是政治经济学，第二年才进入专业学习。他每学期均被评为优等生，1955年还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学生实习积极分子”。不久，他又调到经济系，师从苏联莫斯科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尼·康·卡拉达耶夫，这是首位到我国讲授经济学说史的苏联专家。从此也就决定了汤老师终生从事的专业。

1958年1月研究生毕业时，汤老师被朋友动员到武汉大学任教。1992年11月，因子女均南下广州，他转入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该所后来与经济系合并为经济与管理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汤老师于“文化大革命”后首批（1979年）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升为教授，1990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他长期为武汉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讲授《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以及《剩余价值理论》等经典著作的专题课。1979—1992年间，他招收和培养了14名“经济学说史”专业的硕士生，其

中 11 人后来在国内外著名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91 年至今在武汉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招收和培养了 20 余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这些学生在教学、科研和经济部门中都能胜任工作，并已取得较好的成就。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他参与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材和《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论》等经典著作的辅助教材。他受国家教委委托，作为主编撰写的《近代西方经济学说史》于 1990 年问世后，多次重印，后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要求，于 2002 年与颜鹏飞教授共同修订，以《近代西学经济学》为书名出版。

汤老师从 1961 年开始的近 30 年间，先后兼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等职。“文化大革命”后，在他的主持下，从经济学系中分出管理学系，不久又将经济学系扩展为经济学院。为此，他积极培养和引进大批青年教师，并自筹资金修建学院办公、教学用房和部分教师住房，充实院藏图书。他因推进经济学科在武汉大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多次被学校评为先进工作者。

汤老师从“文化大革命”后至今兼任的社会职务有：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在武汉大学工作时期，曾任湖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省《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到华南师范大学以后，兼任武汉大学教授和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经济学会的顾问职务。

1986 年，他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中法经济学家讨论会，并到格罗诺贝尔大学讲学，次年在美国密西根大

学、布朗戴斯大学访问和讲学。1989年，他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入《世界名人录》。

汤老师承担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和省级重点科研项目。他个人撰写和主编的著作有11部，参编著作有7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他的论著多次获奖，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首届和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广东省政府2005年颁发的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奖中的最高奖“特别学术成就奖”。此外，还获得过湖北省社联、广东省社联、武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以及多个学会、业务部门颁发的多项奖励。1992年他被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6年广东省政府授予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理论学习和实践经验的积累

汤老师依据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常说：做学问要厚积薄发。这里所说的积累，一是指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二是指实践经验，把握现实社会的脉搏。解放初期，从事社会科学的师生首要任务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汤老师也是这样。他说自己在大学阶段时，囫圇吞枣地阅读了不少书籍，包括《反杜林论》之类的原著。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后，有了老师的指导，特别是苏联专家的指导，才逐渐深入下去。他被马克思理论的博大精深所吸引，如饥似渴地整日沉浸其中，特别

是对《资本论》更是逐页通读，重点章节反复读，写书批，记笔记，经常梦见的不是“周公”而是马克思。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阶段的这四年半时间，使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近代西方经济学方面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理论基础。参加工作后，他又进而钻研比《资本论》更难“啃”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文化大革命”后期，为了正本清源，他全面搜集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1975年，他作为主编之一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社会主义经济》（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内部出版），该书是于光远同志在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时建议人民出版社组织编辑的，它以约70万字的篇幅，全面、系统地搜集了马列的有关论述。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古典经济学，他也下过颇深的功夫，他在撰写《近代西方经济学说史》时，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基础上，重新阅读了古典学者的主要原著，甚至浏览了十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由于时代限制，他认为，自己的知识面存在不少缺陷。他说，他对经济史和当代前沿的经济学只有表皮的了解，不懂高等数学和自然科学，最为遗憾的是没能掌握好外文。中学时学了点英语，解放后通通改学俄语，读研究生时尚能阅读俄文专业书籍，后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加之经常下乡，俄语没能继续巩固、提高，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也就“革”得所剩无几了。他痛切地感到，这一切限制了自己在学术上的发展。

汤老师常说：“学问，学问，既要学，也要问。”他认为，同行间的交流、切磋，对于拓宽思路，深入思考，具有重要作用。他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研究》一

书的序言中就把这一点看作是自己完成研究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写道：“在1981年底成立的‘全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形成了一个有20位左右固定成员组成‘〈资本论〉创作史’组，这个小组每年举行一次学术会议，讨论某一手稿或某一创作史问题，并分工介绍苏联、东德、日本等国学者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现状和重要成果。1987年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在宋涛同志的主持下，扩大了研究队伍，拓展了研究课题。这些学术组织的活动，使我受益匪浅，极大地推动了我的研究工作。”后来的《〈资本论〉续篇探索》，不管就构思来看，还是就写作组成员来看，都是在这些学术活动中形成的。汤老师到广东后也同样积极地参与各种学术活动，除了参加省经济学会每月召开的一两次座谈会外，还随省体制改革研究会组织的到全省各县、市调研国有企业改革和建设新农村等重大问题的活动。正是频繁的学术交流，才使他较好地了解现实，写出关于市场经济方面的论著。他认为，参与学术交流，不能企求立竿见影，以为每一次活动都要有明显的效果。正如理论学习不能浅尝辄止一样，学术交流也不存在短期效应。

大革命、大转变时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专业学习，但是，在促使人们深入社会、扎根基层的政治活动中，也促进了他的世界观的转变，取得了更加重要的收获。在大学阶段的前两年，汤老师作为工作队的成员，参加了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扎根串联，访贫问苦，斗地主，分田地，后又参加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学校教职员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各种宣传、调查

活动。最后一年到北京郊区国营农场实习，与农场工人同吃、同劳动。研究生阶段，参加了合作化运动，并到湘北进行过长达数月的城乡经济调查。工作后，参加人民公社变革，以后作为系的负责人，多次率领师生，以县、公社工作队队长的身份，参与“整风整社”、“四清”等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曾深入工厂调查，并写下了《应城膏矿史话》（湖北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汤老师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一开始，他就被划为“走资派”，关进“牛棚”，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这种处境使他更深切地看清“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以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篡改，使他懂得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摆脱了“迷信”，深感理论工作也像其他工作一样，应该“不唯书，不唯上”。“文化大革命”前，汤老师也曾对诸如“三面红旗”之类的现实问题，撰写过一些文章，基本上是对“中央”或某领导人观点的复述或解释。现在看来，这些文章所宣传的观点大多被实践所否定，剩下的也缺乏新意，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实践证明，理论工作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与时俱进，有所创新，才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应有功能。当学生记者访问他，提出“搞理论的似乎都在为政府辩护、开脱”的问题时，他回答说：“‘文化大革命’前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接受的教育有点近乎教条主义。当时，如果自己的研究结果与原来的理论或上级的观点不相符，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问题：研究方向错了？还是研究方法不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才会对某些理论、政策、实践提出质疑，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同时，也维护科学的理论，也为正确的路线、政策论证、辩护、宣传。这一切当然也可以看作是政治服务，但比之过去，更为理性，更为科学，更符合实际，也会更有成效。”

近年来，学术界存在一股浮躁的学风，有的出于提职称的需要，写文章贪多求快，难免粗制滥造，有的为了追名逐利，标新立异，自我炒作。针对这种情况，汤老师特别强调，写文章，做学问，应有一个正确的立足点，要安心坐“冷板凳”，养成多思考、多修改的习惯。他说，把感觉到的问题放在脑子里，经常想想，见到有关资料记下来，形成自己的观点后再动笔。写成文后，不要急于发表，前三五天，每天看一遍，发现问题立即修改，然后放它十天、半个月，再拿出来看看，觉得无需再改时才考虑发表。这样，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读者负责。至于选题，不要赶潮流，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应该逐渐形成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持之以恒，“十年磨一剑”，一定会形成有价值的成果。

对马克思手稿的研究和对《资本论》续篇的探索

在经济学说史领域，汤老师研究的侧重点是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汤老师是我国较早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学者之一。20 世纪的 60 年代，他对马克思 1861—1863 年手稿的主体部分——《剩余价值理论》作了深入研究，并依据当时出版的俄文新版本，撰写了《〈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论〉第四卷）结构初探》（载《武

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这是我国第一篇研究《资本论》第四卷手稿的文章，它多次被收入以后编辑的《资本论》研究学术论文集中。但这项研究因相继而来的“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而被打断，直到80年代中期，即在中断了近20年之后，才又重新开始原来的工作，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研究》（以下简称《手稿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手稿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和评介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专著。首先，它依据国外的有关资料，首次全面介绍了马克思早年写下的几种《摘录笔记》，特别是最为重要的、其篇幅约相当于《资本论》前两卷之和的《伦敦笔记》。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梳理、分析和摘录了众多的经济学著作和有关文献，写了不少评论。这些笔记对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对了解马克思研究经济领域的深度和广度，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它着重研究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过程中留下的三部篇幅巨大的手稿，即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5年手稿，着重探讨了这些手稿的理论要素、逻辑结构的形成，对部分手稿的写作年代、写作顺序作了考证。再次，研究了从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的演进过程，内在结构的形成过程，从史的角度阐述了其中的重要理论。最后，研究了《资本论》和“六册计划”的关系。马克思关于六册著作的设想，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是与国际学术界曾经流行的如下一个观点有关，即认为《资本论》四卷的形成，否定了“六册计划”及其结构。《手稿研究》

在整理“六册计划”基本要点的基础上，以大量确凿的证据，推翻了这个结论，并阐释了“六册计划”的科学意义，从而重新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物质生产，从而是研究表现为一定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因此，不能像《资本论》那样，只研究基本关系，而应像“六册计划”一样，扩展到整个经济制度。

《手稿研究》出版后，受到同行专家的好评。中央编译局张钟朴研究员撰文指出该书“内容新，起点高，几乎包括了迄今为止国内外这方面发表的所有新数据”，同时，“对国际学术界争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创见解，在某些问题上独树一帜，敢于向权威们挑战”，其研究“达到了国际水平”，并肯定了该书的现实意义。经专家评审，该书获得国家教委1995年颁发的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手稿研究》对否定“六册计划”观点的否定，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拓展出了一个新的领域。但是，由于“六册计划”仅有简略提纲，有关理论既分散又未展开，对它作出系统论述，不管是在材料的搜集上，还是对论点提示的理解和阐释上，都存在极大的难度。正因如此，不仅我国学术界，包括原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在内的整个国际学术界，都只有研究“六册计划”个别问题的论文发表，而没有全面论述的专著问世。这一极其艰巨的任务，需要群策群力，才有可能完成。1992年，汤老师任主编，与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学者

共同承担了研究“六册计划”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他们依据散见于马克思大量手稿和书信中的有关“六册计划”的内容和逻辑联系的提示，依据对马克思方法论和经济思想的系统理解，经过三年的搜集、整理数据，反复研讨，共同撰写出一部 60 万字的专著——《〈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以下简称《探索》），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在 1995 年出版。这部书将“六册计划”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思想从总体上呈现出来，填补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探索》的要点，第一，作为主体的部分，是探讨马克思拟在“六册计划”中分别论述的各个领域的专门理论，即竞争理论、信用理论、股份资本理论、土地所有制理论、雇佣劳动理论、作为“生产者”的国家理论、对外贸易理论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总体的世界市场理论和危机理论。《探索》在论述这些理论时，是严格地以马克思已有的论述、观点和提示为基础，沿着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轨道进行阐释的。这种科学严谨的态度，保证了《探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成为系统而完整地掌握马克思全部经济理论的重要依据。第二，《探索》探讨了各个经济领域的专门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或者说研究了作为理论和方法的表现形式的内在结构。这种研究，既是在深层次上对理论的思考，也是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诠释。它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把握“六册计划”的科学性，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探索》考察了这些理论的形成过程，因而《探索》也可说是以研究马克思各个专门经济理论为对象的理论史著作。这同

样填补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项空白。第四,《探索》分析了这些理论与《资本论》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研究本质关系的《资本论》为探讨其他专门理论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但《资本论》只在研究资本一般概念的限度内涉及其他专门理论,而没有包容,也不可能包容其他专门理论。最后,《探索》补充论述了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经济发展的重大的新情况。例如,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信用的新形式,信用和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考察了世界市场总体在当今的发展,论述了当代资本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形成、国际经济一体化各种形式的发展等,从而把马克思经济理论同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结合起来。《探索》以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表明它是对除《资本论》之外的马克思留下来的经济学遗产的系统整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马克思未竟事业的局部完成。

《探索》注意从手稿中发掘出那些对经济改革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澄清被忽视、被误解的观点,并注意发掘和介绍“六册计划”中新的特别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在《资本论》以及人们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有的只有简略论述,有的完全没有涉及。这些新的理论观点,大多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和世界经济的演变发展的指导思想。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从根本

上否定了曾经流行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空地’上”的观点，为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经济形式、企业管理结构等扫除了思想障碍。《探索》对这些理论的发掘和整理，既具有发展理论的意义，也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

《探索》对“六册计划”研究的重大理论意义在于，它为我们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展现出新的思路 and 理论启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做出了新的说明。《探索》对“六册计划”的肯定和对“六册计划”科学意义的阐述，为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建立理论经济学的新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展示出新的理论框架。

《探索》出版后，受到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重要报刊上发表了书评（其中《中国社会科学》两篇，《经济学动态》一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两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各一篇），对《探索》给予了颇高的评价，如认为“本书内容十分丰富，使马克思生前未及完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研究的各个方面，第一次在理论上得到了完善、系统的表述，填补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空白”，“这部著作是近十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在这一课题研究中的最为突出的新成果”，甚至认为《探索》的出版“是我国《资本论》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和一座重要的界碑，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和一座重要的界碑”。

《探索》先后获得教育部 1998 年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1999 年颁发的首届